

牢记总书记嘱托 讲好云南红色故事

开栏的话

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传承红色基因，落实主题教育要求，文史哲版面推出“牢记总书记嘱托 讲好云南红色故事”专栏，回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根、思想之源，揭示党的百年奋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思想密码和历史逻辑。

扎西会议 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扎西会议会址 寸新元 摄

红军长征的历史有如一座巍峨的精神宝库，总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激发出强大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后的新起点。扎西会议的光辉历史蕴含

着我们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凝结着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感悟初心使命，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明确组织调正航向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子、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解决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没有来得及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这些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

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陈云1935年二三月份形成的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录了相关内容：“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扩大会完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是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第一次系统总结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对于总结和汲取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清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

研究部署新战略方针

在扎西会议上，为扭转当前各苏区和红军部队“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被动局面，党中央决定重新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对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研究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

根据扎西会议2月9日的会议决定，在川滇黔3省开展游击战争，要求“在

运动战中各个击破”，并成立红二、红六军团新的领导集体。

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来到昭通彝良，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坚决贯彻扎西会议后的战略指示和遵义会议《决议大纲》精神，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在大山里和敌人兜圈转，三进三出彝良奎香，摆脱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取得了著名的“乌蒙回旋战”胜利，谱写了长征史上的壮丽篇章。同时，依据当时敌情变化，中央政治局调整遵义会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

队伍建设启航新征程

同时，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云贵川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被抽调留下来的部分同志听党指挥，服从安排，自觉担负起使命任务，在川滇黔边区宣传发动和组织武装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长征北上。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中，纵队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坚持斗争长达12年，凭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英勇斗争，用热血和生命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卷上书写了悲壮的一页。

红色基因代代传

党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200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印发的《红军长征基本史实和重要提法》中提出：“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征程。扎西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开创了革命新的起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期间，干部战士严守纪律，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发自

内心地拥护和支持红军。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扎西会议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伟大长征精神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不断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个革命故事、每一件革命物件，每一次战斗、每一次牺牲、每一次决议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汇聚成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扎西会议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走向强大的艰辛征程，记录着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伟大红军长征精神

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振奋红军的革命精神起到了极大作用。周恩来在《历史的教训》中指出：这个决议“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对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扎西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过程中，坚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民主集中制，顾全大局。通过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确立了组织上的正确领导，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主导权，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

战略方针，作出改变原定渡江计划，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战略决策。扎西会议提出，要以大规模的游击战调动敌人，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明确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特征的新的战略战术。此后，红军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作战，穿插于敌子，三进三出彝良奎香，摆脱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取得了著名的“乌蒙回旋战”胜利，谱写了长征史上的壮丽篇章。同时，依据当时敌情变化，中央政治局调整遵义会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

红军进驻扎西时正逢春节，扎西会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使红军的革命斗争在磅礴的乌蒙山走出寒冬，迎来新春的温暖阳光，从被动变为主动。在扎西集结的11天时间里，红军战士严守纪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除了粘贴各种标语口号，还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真心关心老百姓的实际行动让当地穷苦人深刻感受到红军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队伍。在红军的感召下，威信青壮年中就有3000余人积极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革命武装，这也是红军自长征以来较大规模的一次“扩红”。

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用好活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讲深讲好扎西会议故事，通过进一步挖掘、保护和运用好扎西会议红色资源，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让革命遗址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出特出彩，让扎西会议在传承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精神光芒。

【本文系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研究》（项目编号：ZDZB202204）阶段性成果。】

3000多人的扎西扩红

李 荣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每当这首由陆定一、贾拓夫创作的《长征歌》在云南威信群众间传唱时，总会让人忆及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红军扩大兵员，简称“扩红”）的故事。

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每年过年老百姓都有蒸糯米饭、打糍粑的习俗。1935年2月初，村民正在为迎接春节做准备，国民党政府传来消息说红军要来了，并向村民描述红军长着红眉毛、绿眼睛，还要抓壮丁充军，吓得很多村民都逃进山里躲了起来。当红军真正进入扎西后，他们亲民、爱民、为民的举动让扎西人民认识到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红军进驻扎西后迅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对一些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员和作恶多端的地霸头目，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处决，缴获的财物除少部分作为红军后勤筹粮筹款外，购置盐巴、粮食、猪肉、布匹等物品分发给群众。红军这些做法得到了群众的“民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打下了群众基础。例如红军到达石坎子时，当地区长王明九主动派人与红军接洽商谈，表示愿意帮助红军，并派人送交大米五十石（两千斤）、肥猪三头、一些猪油和鸡蛋等支物资。

扫清敌军时，红军预先开展宣传工作，与群众做好沟通和保障，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红军在扎西镇禹王宫、大河滩、罗布坳等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向群众解释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是帮助人民打倒云南军阀、铲除贪官污吏、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的队伍，要实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做到人人有衣穿、有饭吃。同时揭露了国民党黑暗腐朽的统治，号召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通过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等纲领文件来宣传党的主张；张贴“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云南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云南军阀”“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口号，号召组

织群众参加革命，为建立革命政权做准备。

作为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红军集结扎西期间严守军纪军规，时逢过年，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年货，红军战士无论去哪，住在哪，坚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临走时还将门板铺草收拾好，屋子打扫干净，水缸挑满水，主人不在家还要留下纸条：“本屋的主人，我们走了，屋子打扫干净，快回来看看你的屋，以免别人拿走你的东西。”

看到红军处处为老百姓惩奸除恶，做好事，办实事，当地各族群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自己人，从心里真正认可并支持红军。群众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其中就有一位特殊的“扩红”人员——威信县原县长叶天荣。叶天荣青年时代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陆大学。他时常与中共党员浦光宗、王启瑞等一大批有抱负的精英学子聚在一起，是进步人士。1932年，叶天荣任威信县长后，为官清廉，除暴安良，为民请愿，慷慨救济，深得当地百姓拥护，被称为“叶青天”。期间由于叶天荣废除了当地鸦片种植等恶习，得罪了国民党统治阶层，任职不到3年，便被免职改任文职。1935年2月，叶天荣得知红军来到扎西，特意找到红军领导人，要求加入红军。这段历史，被陈云记录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红军到威信时，在某一村中，有东陆大学毕业云南省某县县长者，前来会晤红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红军进攻云南。”

红军在扎西用行动、用信仰、用纪律、用心、用情，将革命的火种埋进了当地群众的心里，壮大了革命队伍。时任中革军委总部二局党支部书记、译电员戴镜元回忆道：“在扎西一带，我们又扩大了红军3000多人。这里参加红军的气氛非常热烈，他们不是三五个参加，而是成批成批地几十个几百个地参加。云南的各个兄弟民族受云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很深，一号号召打云南军阀，群众就纷纷响应，踊跃参加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扎西扩红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仅次于遵义扩红的一次扩红，之后革命的烈火从威信燃到会泽，从会泽燃到云南各地。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12年的艰苦斗争

李 荣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威信地区，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从1936年9月正式成立，到1947年3月被国民党“围剿”失败，云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的带领下，进行了长达12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解放边区各族人民，创建以威信郭家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5年2月5日至10日，扎西会议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由于红军树立了良好的群众影响力，当地各族群众看到了希望，威信县罗布坳郭家坟村贫苦农民殷禄才，决心组织武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同年秋，殷禄才主动找到在川滇黔边区活动的纵队表明思想立场，希望红军给予指导帮助。川南特委和纵队领导对他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勉励他在本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打好基础，壮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并与纵队保持联系，及时报告情况。殷禄才牢记嘱托，积极发展壮大队伍，至1936年6月，这支农民武装已发展到近百人。

1936年夏，游击纵队活动到郭家坟地区时，殷禄才及时找到纵队领导汇报情况，并反映了边境一带的敌情动向。鉴于殷禄才在思想和具体行动上的表现，纵队决定留他随军培训学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后经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介绍、特委批准，殷禄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特委和纵队指派殷禄才返回威信郭家坟，将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正式任命殷禄才为支队长，配发10多支枪，指示他以郭家坟为中心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久，又派红军干部陈华久担任支队政治委员，另派5名红军战士到支队工作，加强党对支队的领导。

云南游击支队成立后，继承了红军优良传统，加强思想工作，严格执行纪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随着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7年1月，川滇黔游击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会剿”中失利，云南游击支队在失去上级领导、斗争又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没有退缩，依然按照特委和纵队原来的部署，继续在川滇边的兴文、珙县、威信、镇雄等地活动。

1938年，按照中央部署云南游击支队积极组织民众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队伍得到了巩固发展，人员进一步壮大。这一时期，云南游击支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轻群众负担，部队在郭家坟、水井坎等边界地方，实行了以兵屯田的办法，组织生产劳动，平时寓兵于农，战时集中打仗，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紧密结合的良好形式。到抗日战争胜利前，支队已发展到400多人，外围联系的武装四百多人，支队编为8个大队，大队下设分队和警卫队。

云南游击支队在川滇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威信县长强令支队解散。支队严正答复：枪是工农武装斗争的命根子，决不能上缴；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合理合法，政府无权解散，只有打倒国民党军阀、买办、地霸的独裁反动统治，穷苦民众才能翻身解放。

自建立之日起，这支穿梭在云南边区的游击支队先后经历国民党和地方团队7次“围剿”，6次取胜。1947年2月，国民党各路敌军倾巢出动，第七次开展对支队的全面“围剿”，叫嚣“宁可杀错，不可漏网”“谁知知情不报或放脱匪徒以通匪论罪”。此时云南游击支队正在司营铺一带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支队四面受敌，陷入围困。3月19日，殷禄才和陈华久上山寻找食物，被敌密引来敌军，陈华久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殷禄才坚持战斗到最后时刻，为了不当俘虏，留下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壮烈牺牲。云南游击支队在殷禄才、陈华久等共产党员带领下，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云南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荣的一页。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寸新元 摄